

1993年元史研究概况

张金铄 吴海涛

1993年国内的元史研究,较之往年又有一定的进展。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的《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六十余万言,比较详尽地叙述有元一代的历史,并有不少新的见解和具体事件的考订。中国元史研究会主编的《元史论丛》第五辑,刊载二十二篇论文,于1993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见诸报刊的学术论文约有一百三十余篇,其内容涉及到蒙元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一、政治、军事

政治史的研究一向为元史研究者所关注,并在元史研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93年的元史研究仍表现了这一特点。

政治制度、官僚制度仍旧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姚大力在《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书机构的体制演变》(《历史研究》第1期)中,通过剖析蒙元时期行政中枢由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体制的演变过程,认为:一、《元史》有关中统元年先立中书省,而后才有建燕京行中书省的记载,并不确切,事实上作为大汗中枢机构分支的燕京行台,首先完成了体制转换,并成为整个国家行政中枢向中原制度体系过渡的重要依托;二、元初行政中枢从大断事官机构演变为中书省,并不是大断事官制改换或者重新创立一个新的汉语译名问题,而恰恰反映了元代中央官制的主干部分从蒙古旧制向中原传统体制演变的实质;三、元以中书省代之金尚书省总政务,必定是因后者在当时已被比照为蒙古旧制中的大断事官机构的缘故。姚景安在《郝经“失致治之机”辩》(《元史论丛》第五辑)一文对郝经所称的成吉思汗“初下燕云奄有河朔”之时、窝阔台“既定西域,灭金源”之后和蒙哥汗之世,未行汉法,致“三失致治之机”之说进行分析,认为要使蒙古统治者以汉法治理中原,必须完成两个飞跃,一是实现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二是使蒙古的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从当时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种条件并不具备,不存在“失致治之机”的问题。郝经只看到在中原地区推行汉法的必要性,而未认识到蒙古统治者实现两种文化融合和社会制度过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潘修人的《元代达鲁花赤的职掌及为政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达鲁花赤并非“监而不治”,而是握有实权,对地方政治负有责任,元政府对他们定期考核,并根据治绩予以黜陟。吴文涛的《论元代地方监察制度的特点》(《华中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元代监察制度有其鲜明的特点,自中央到地方自成系统,事权独立;监察官吏本系统内部推举,中台大员由皇帝直接任免;监察范围宽泛、职责明确;待遇优厚,升迁快捷;考核严格。科举方面,美籍学者刘元珠认为元初儒人多不欲“就吏”,但到成宗以后,学校的发展和对吏才重视,“由儒入吏”、“由吏入仕”已渐为士人所接受,成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儒人多入吏,仁宗延祐开科,但贡举人数有限,入仕仍多藉吏途,故其排抑吏员,并没得到儒士的普遍支持(《蒙元儒吏关系:延祐开科与抑吏》,载《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讨

论会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丁鼎的《金人、元人所谓“进士”也往往不是及第进士》（《文史知识》第6期）辨别了当时“进士”与及第进士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在地方行政方面，史卫民发表了《元朝前期的宣抚司和宣慰司》（《元史论丛》第五辑），对世祖时期宣抚司、宣慰司的置废、职能、与行省和监司的关系作了分析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治安在《元代晋王封藩问题探讨》（《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对漠北晋王封藩的辖地、军队、领民、权限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漠北为蒙元肇基之地和边防重地，晋王且为太祖嫡派，故在元朝中后期漠北乃至朝廷政务中都居重要地位，其地位势力又高于其他出镇宗王，也是也孙帖木儿入继大统的有利条件。但晋王封藩不同于兀鲁思分封，基本上属于封藩而不治藩，重在军事镇戍，且与官僚制相补充的蒙古分封制的特殊形式。晋王封藩对于元廷控制漠北本土、增强忽必烈家族与漠北草原游牧贵族的有机联系和维系元帝国蒙汉二元政治文化体制有较深刻的影响。沈卫荣的《论元代乌斯藏十三万户的建立》（《元史论丛》第五辑）和英国学者凯普的《八思巴时期的两种行政体制》（陈庆英译《西藏民院学报》第1期）对元代吐蕃的地方行政加以探讨。沈卫荣对目前国内外关于十三万户建立时间的四种说法进行分析，认为乌斯藏十三万户的建立不是一次完成的，各万户建立的时间有先后之分，最早于1254年出现的伯木古鲁万户开始，至1268年最终确定乌斯藏十三万户这一名称之间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于蒙古占领并渐次牢固地统治乌思藏地区的进程基本一致。同时乌斯藏十三万户的划分实际上即是对当时该地区实际存在的分裂割据局面的承认，而十三万户本身就是接受蒙古统治者诏封的十三个地方势力。另外，陈育宁的《元代对宁夏地区的经略》（《西北史地》第3期）论述了宁夏地区的行政设施。

军事方面，刘迎胜《皇庆、至治年间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元史论丛》第五辑）对仁宗、英宗时期十余年间元廷与察合台汗国之错综复杂的和战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分析其和战的原因及实质，并对涉及到人物脱火赤、拜住等人及其事迹作了考证。丛佩远的《元初乃颜、哈丹之乱》（《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分析乃颜、哈丹之乱的原因，并论述元朝平乱的作战部署、经过及其影响。对蒙元兴起和统一中的战争，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主要有陶刚的《成吉思汗五伐西夏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藤新才的《宋末万州城抗元保卫战》（《四川文物》第1期），王炎的《宋元战争中蒙古战略决策的效能比较》（《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此外，沈加元对辽金元三朝的军事供给作了研究（《辽金元三代对军事经济与后勤问题的研究》，载《内江师专学报》第1期），冯修青对元初的答刺罕军也作了探讨（《答刺罕军考略》，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

关于元末农民起义，主要论文有卢心铭的《元代人民起义与民间歌谣》（《元史论丛》第五辑）和邹德彰的《元末农民战争与社会经济》（《晋阳学刊》第1期）。前者探讨了民间歌谣对农民起义的影响和作用，并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作了分析。后者从明初社会经济研究入手，认为农民战争调整了元末的土地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

元代经济制度方面，高树林对“诸色户计”作过系列研究，发表了《元朝民户研究》（《河北大学学报》第2期）和《元朝匠户研究》（《河北学刊》第5期），对元代民户、匠户的赋役及其社会地位作了探讨。谢映先发表了《蒙元时期的税制》（《云南税务》第6期）。

租佃关系仍是人们重视的问题。刘永华的《宋元以来闽西的土客之争与佃农斗争》（《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第 2 期)和高敏的《从〈水浒传〉看宋元时期的庄客、庄户与庄园主的关系》(《郑州大学学报》第 4 期)又作了探讨。

区域经济方面,舒正方的《富称塞北的上都》(《经济·社会》第 5 期)认为,上都因都城所在,统治者的重视,在元代交通、文化发达,农业、手工业、商业和畜牧业都有巨大的发展。张照东的《元代山东区域的开发及其特征》(《山东社会科学》第 2 期)探讨其农业、手工业中各行业以及商业情况,并分析其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元代前后期发展的趋势。李蔚的《试论元代西北屯田的若干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第 2 期)和吴宏岐《元代南方农作物的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2 期),丛佩远《辽阳行省的农业》(《北方文物》第 1 期),成岳冲《论宋元宁波地区主干水利工程的分布》(《浙江学刊》第 6 期)等文章都对其地区经济作了研究。

货币与商品经济方面,《内蒙古金融研究》第 2 期(钱币专刊)刊载了《浅谈元朝纸币的产生原因及流通特点》(吴建军著)、《丝绸之路蒙古诸国钱币上的畏兀体蒙古文》(陈乃雄著)、《蒙古人的纸币》([蒙古]萨格德尔苏荣著,陈乃雄译)等三篇有关元代货币的论述。陈贤春的《元代粮食商品化的研究》(《湖北大学学报》第 1 期)从生产、流通两个环节探讨元代粮食商品化问题,认为南粮北运是元代的一项基本国策,江浙、江西、两淮、湖广四大产粮区,每年均有大量粮食输往北方缺粮区,同时贩鬻全国各地的粮食也大为增加,而城市居民用粮几乎“全藉客旅兴贩供给”。刘秋根的《论元代私营高利贷资本》(《河北学刊》第 3 期),对元代私营高利贷资本运营的内容、形式、利率及社会价值、经济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三、民族、宗教

关于蒙古族的早期传说及其形成,主要有姚大力的《“狼生”传说与早期蒙古部族的构成》(《元史论丛》第五辑)、阿尔丁夫的《感天狼而生,还是感光而生:关于〈元朝秘史〉中阿阑豁阿感生神话传说新探之一》(《黑龙江民族丛刊》第 2 期)。蔡家艺的《12—17 世纪初年蒙古族社会经济发展述略》(《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探讨了元明时期蒙古族的社会经济。在蒙古族与其他民族关系上,有何天明的《试探元代蒙古与契丹的关系》(《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总第 14 期)和王崇实的《元代蒙古习俗对高丽的影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 3 期)等文章。丛佩远在《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人》(《史学集刊》第 1 期)中认为,蒙元时期,多民族居住的东北地区民族成分及其分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加了一些新的成员。因其为东道诸王封地,后又设辽阳行省,蒙族向行省西部和中南部迅速推进,其人口空前增多,色目人也随之迁入。土著东北、分布地域较广的女真族人口锐减,向后退缩,高丽族自东南方向进入辽东腹地,契丹族至元中叶消失,融合到蒙古和汉人之中。对蒙古族的历史人物也有不少研究。刘迎胜发表了《忙古带把阿秃儿及其在忽炭地区的活动》(英文)(载《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和《床兀儿及其家族的活动》(《西域研究》第 3 期),后者对源于蒙古高原东部的钦察部名将床兀儿及其家族的事迹进行考述并讨论其建康的封户和哈刺赤户。修晓波的《关于木华黎家族世系的几个问题》(《蒙古史研究》第 1 期),对木华黎之后塔思与霸都鲁是叔侄还是弟兄,安童、乃蛮台、朵儿只以及朵尔直班与木华黎的传承关系等问题作了一些探索,并分析《元史》编纂木华黎后裔世次前后矛盾的原因。张云的《答失蛮其人及其经略吐蕃考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4 期),结合汉藏文史料,对答失蛮其人及其在吐蕃经略,建立驿站,平定必里公之乱以及出任总制院使和宣政院使的活动进行考述。

回回问题,杨志玖先生在《回族研究》1993年第2、3、4期上相继发表《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续)、《元代回回人的社会地位》、《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一)等文章,对元代回回人的分布作了研究,并认为,元代回回人有政府法令为依据,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保障,在仕宦、科举、学校教育以及刑法上享有优于汉人的待遇,经济上免差役,并长期免征包银,地位高于汉人、南人,仅次于蒙古人,是蒙古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的工具。后者对蒙古国前四汗时期回回人的活动进行探讨,认为回回人是当时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关于回回问题的论文还有汤开建的《关于“回回”最早出现于西夏的问题的补证》(《民族研究》第1期)和自非的《辽宁回族来源考略》(《满族研究》第2期)。杨志玖还对西域哈刺鲁阿儿思兰汗家族人物和事迹进行了考述(《元史论丛》第五辑)。

元代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所谓“三教九流,莫不崇奉”,各宗教皆有一席之地。有关宗教的研究论述也较多。王宗维的《元代安西王信奉伊斯兰教说质疑》(《民族研究》第2期)对较流行的元安西王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提出疑问。该文认为,阿难答自幼受儒学熏陶,本人崇佛,史有所载,且其嫁女兀刺真公主于崇佛之高昌王,亦与穆斯林教规有违。《史集》虽记其信奉伊斯兰教,但该书对安西王之事记述多有失误,如忽必烈赐唐兀惕地与阿难答,该地二十四大城居民大多为木速蛮,阿难答所有的十五万军队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等,故此说并不可靠,作者还分析了《史集》记载失误的原因。正茂的《元代汪古部基督教浅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对汪古部信奉基督教的原因和其首领阔里吉思崇奉基督教活动进行了探讨。佛教方面,温玉成的《金元糠禅述略》(《元史论丛》第五辑),对金元时期流行于社会下层的糠禅(大头陀教)的史实加以考索。

四、文化、思想

礼俗婚姻问题,主要有三篇,黄时鉴的《元朝庙制的二元性特征》(《元史论丛》第五辑),分析了元代庙制的两个重要特征,即蒙古祭礼和双重庙号,进而指出,忽必烈建立元朝基本上采用汉法,进行统治,同时也保存了许多国俗,即蒙古固有的制度和礼俗。庙制是汉法所见的传统,元朝采用庙制,但同时又使它含有鲜明的蒙古因素,这也反映了元朝政治制度的二元特色。杨毅的《说元代的收继婚》(《元史论丛》第五辑)认为,蒙元时期,子收父亲、侄收婶母、弟收兄嫂的三种类型的收继婚俗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中的大多数民族普遍存在,蒙古贵族在中原统治的确立和蒙古、色目人大量入居汉地,把他们民族中盛行的收继婚俗也带了进来。由于民族交往的增强和民族联姻,早已绝迹的收继婚在北方相当规模地盛行,但北方汉人的收继婚基本上属于平辈收继中的“弟收兄嫂”型,也为前期和中期的元政府所允准。文宗之后,随着理学势力的增强和政府的措施,汉人中的收继婚走向衰亡。作者还对元廷“各从本俗”之外,允许汉人平辈收继以及文宗之后对汉人收继的厉行禁止的原因作了探讨。张靖龙的《元代妇女再嫁问题初探》(《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通过对前代婚俗、贞节观念以及与元朝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发展变化关系的考索,初步探讨了元代妇女的再嫁问题。文章认为,程朱理学并未对宋代妇女的自由改嫁产生实际的影响,而一直实行收继婚制的蒙古、色目婚俗则对贞节观念起到了一定的淡化作用;历经战争的前期元朝,出于经济恢复的需要,大力鼓励人口的增殖,因而对妇女的再嫁采取宽松、自由的态度;元朝后期随着经济的恢复、蒙古汉化程度的加深和理学家在中央政权内影响的扩大,贞节观念得到官方的重视和强调,但终元之世,妇女自由改嫁的风气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经筵是为皇帝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席讲座。张帆的《元代经筵述论》(《元史论丛》第五辑)和王

风雷的《元代的经筵》(《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讨论了这一问题。前者以泰定元年为界,把元代经筵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一阶段经筵逐渐规范化、制度化。两文对经筵的形式、内容及其意义都作了分析。

关于元代的学校,王风雷相继发表了《元代的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内蒙古师大学报》第2期)和《元代的国子祭酒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前者论述了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的设立及其概况,后者考订了自冯志亨、许衡之后历任国子祭酒的官员及其任职期限,并对国子祭酒的选拔途径、地位、特点和意义作了论述。元代“郡县莫不有学”,陈高华的《元代地方官学》(《元史论丛》第五辑)和王立平的《元代地方官学的建筑规模及学田》(《固原师专学报》第1期)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陈高华认为,从蒙古国到元朝,地方官学经历了一个衰败、恢复和发展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体系,它以儒学为中心,包括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书学和社学。并对官学的系统、学官、学田以及各种地方官学的规模及其弊端进行深入的探讨。王立平认为地方官学的建筑,一般是由以文庙为中心的庙域,以讲堂为中心的教学区和以宿舍为中心的生活区三部分设施构成,其建筑规模以其所在的行政区的级别差异而有所不同,而斋舍数量是衡量官学规模的标准。路学斋舍较多,有多至八舍者,州次之,县最小,一般仅有二斋,官学多有藏书楼。学田是官学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其来源多为公田和私人捐赠,亦有收买者。于金生著文对地方学官及其社会地位作了分析(《元代地方学官及其社会地位》,载《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

文化和思想方面,李春祥的《包公戏与中国法文化》(《河北学刊》第3期)通过对现存的十一种包公戏内容的分析,认为中国法文化包含着“刑以正邪”、“法出于礼”、“刑不上大夫”等方面的内容。白钢在《许衡与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命运》(《元史论丛》第五辑)中,探讨了许衡政治、哲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及其成就和对时代的影响。汪汉卿在《许衡的法律思想》(《法学研究》第2期)认为许衡的法律思想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一、其指导思想是崇儒学,行汉法;二、在法理学上,提出“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维,上安下顺”的观点;三、重视法律实施的环境,提出不“患法令难行”,而“患法令无可行之地”,把法的实施于政治结合起来,认为,为使法有“可行之地”须从经济和教化两方面着手,“劝农桑以厚民生”,“修学校以善民心”;四、君主率先垂法,带头守法。熊笃等人对张养浩、赵孟頫、杨维桢等人文化思想作过分析(熊笃《张养浩的人生观及其两次辞官归隐的原因》,《河北学刊》第1期;秦勤《张养浩的仕隐官及其政治思想》,《四川师大学报》第1期;刘清扬《论赵孟頫仕元的矛盾心境与他的书学主张》,《四川学院学报》第1期;么书仪《略论杨维桢多变的生活道路》,《文学遗产》第2期)。周良霄的《赵复小考》(《元史论丛》第五辑)对赵复的行实、卒年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证。桂栖鹏在《萨都刺卒年考——兼论干文传〈雁门集序〉为伪作》(《文学遗产》第5期)中,纠正以往学者对萨都刺卒年的误订,考出其卒年为后至元四年三月到后至元六年底之间,并从《雁门集序》中叙述萨都刺履历的舛误、元代名公谥号、族别、作者署年、题衔等方面的错误以及作者对元官制常识的缺乏,推断该序非干文传所作,为伪作。陈世松、史乐民的《宋末元初蜀士流寓东南问题探讨》(《元史论丛》第五辑)探讨了宋末元初蜀士流寓的历史背景、流寓东南的经过,并阐述其寓居东南的情形。另外,韩志远在《元好问在金元之际的政治活动》(《元史论丛》第五辑)通过对元好问在金任地方官、汴京时期的行动和蒙古国的政治活动,认为元好问在当时政治上并无作为,也不属于思想家。这种状况是由于其本人既不愿隐居,做金朝的殉葬者,但又碍于名节,不愿公开改仕新朝,只希望待价而沽的矛盾心境所造成的。

元代的科技研究,论文不多。吕一燃探讨了元代的“回回炮”(《关于西域回回炮及其东传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贺威阐述了宋元福建棉纺织技术概况(《宋元福建棉纺织科学技术初探》,载《福建史志》第1期)。

五、史料、文献

史料和文献研究方面,刘迎胜在《〈史集·部族志·札刺亦儿传〉研究》(《蒙古史研究》第1期)中,把1965年苏联的《史集·部族志》波斯文合校本中《札刺亦儿传》的前半段和波斯文的校勘记,译为汉文,并在注释中提出自己的见解。罗贤佑在《元代云南地区的民族实录——〈云南志略〉》(《民族研究》第1期)介绍了该书的版本、存留以及著者李京的情况,指出该书的史料价值和缺陷,并通过该书研究当时云南境内各民族的概况。方龄贵的《〈通制条格〉新探》(《历史研究》第3期),分析《通制条格》的内容,并考订其源流,对其在研究元代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史料价值作了探讨。杨讷的《〈心史〉真伪辨》(《元史论丛》第五辑),进一步肯定《心史》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对《心史》中记事的某些失误提出新的见解。瞿林东、张昌茂分别对《文献通考》和《大德昌国州志》进行研究(《〈文献通考〉的理论价值》,载《安徽史学》第2期;《谈元大德〈昌国州志〉的编纂特点及史料价值》,载《浙江方志》第5期)。周丕显的《清代舆地学与元史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第1期)探讨了清代舆地学对文人研究元史的影响以及清代元史研究的成就。陈得芝的《读伯希和译注八思巴字怀宁王海山令旨》(《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介绍了《怀宁王海山令旨》的来历以及伯希和译注的方法和成就,总结其对海山为汉名的考释,又进一步从两条汉文材料中考证出海山一名为道教首领张留孙所取,义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并纠正伯希和对某些词句的误释。此外,还有贾敬颜的《王恽〈开平行记〉疏证稿》(《元史论丛》第五辑),杨寄林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摘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孟楠的《读〈圣武亲征录〉札记一则》(《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羽离子的《〈元史〉等六史中爱薛传甄误》(《南通教院学报》第1期)等文章。

六、石刻、文物

石刻方面,郭济生在《山东淄博刘家营村蒙古斡罗那歹氏刻石》(《元史论丛》第五辑)介绍了近年出土的顺帝至正六年刘氏先莹祭石二方,并校录其两石刻全文。李西樵的《汪古部石幢考释》(《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对该石幢中涉及的纪年和人物进行考释。另外,日本学者北村高在《关于孟速思家族供养图》(《元史论丛》第五辑)中,把藏于德国柏林的有十片文书组成的“孟速思家族供养图”的研究情况作了全面的介绍。

文物方面,介绍的文章较多。关于印绶,有董学增、董学权《辽阳等处打捕鹰坊红花总管府印》、周九宜《湖南宁远出土一枚铜质八思巴“宁远务”官押》、赵景文、刘雪山《近年出土的部分金元官印》、武健《山东济宁出土的元代官印》、王纪潮《新发现的元末陈友谅“汉授天命主公之印”》等文章,分别刊载于《文物》第3、6、12期;关于瓷器,有范凤妹《介绍江西新近发现的两件元代青花瓷器》(《文物》第7期)、胡闻及雷秋江《广西横县出土青花人物故事图罐》(《文物》第11期)等文章;关于墓葬,有邱永生、徐旭《江苏徐州大山头元代纪年画像石墓》(《考古》第12期),洛阳第二文物队《洛阳伊川元墓发掘简报》(《文物》第5期)等文章。其他方面,还有景竹友《治山出土元代窖藏》(《四川文物》第6期)、李振奇《河北临县发现元代铜权》(《考古》第5期)、王正华等人《勋县发现“至元通行

宝钞”双面铜钞版》(《江汉考古》第3期)、李逸友《元上都城砧于山出土的钱币》(《内蒙古金融研究》第2期)、《太仓出土元代渔船缆绳》(《人民日报》海外版,2月4日)等文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大学历史系、三河县文管所等单位联合发表的《河北三河县辽金元时代墓葬出土遗物》(《考古》第12期)一文,对三河县行仁庄“方桌子”辽金墓区和张白塔村元墓出土的文物进行了分析研究。傅熹年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又据《人民日报》5月8日报道,宁夏发现了元代安西王府遗址。

七、历史地理

刘迎胜相继发表《察合台汗国疆域与历史沿革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和《至元初年以前的垂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蒙古史研究》第4期)两篇关于西域历史地理的论文。前者以《经世大典图志》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的地名为线索,探讨屡次变动的察合台汗国的疆域,把察合台汗国势力前后所及的畏兀儿地以外的地区分为天山以北金山以南地区、天山以南地区、拔汗那地区、察赤地区、阿姆河以北地区、阿姆河以南地区等六部分,来探讨其疆域之沿革。后者探讨自蒙古国到至元初年五十年间该地区历史发展的轮廓以及该地区对当时西域局势的影响。

在地理位置考订上,崔璇《安答堡子、按打堡子、雁塔堡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不同意《元代汪古部长食邑按打堡子考》一文所云,“按打堡子”即《三云筹俎考》中之“雁塔堡”之说。认为“安答堡子”即“按打堡子”,但不是“雁塔堡”,雁塔堡应在山西大同附近,而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的阿伦苏木古城才是汪古部食邑按打堡子,亦即元德宁路遗址所在。此外,还有杨启昌《元代临西县治所设于何处》(《南中》第5期)、李子杰《成吉思汗病殁与陵地问题》(《固原师专学报》第6期)、邵如林《元亦都护纽林的斤葬地考》(《西北史地》第1期)、许成等《六盘山成吉思汗卒地与安西王府》(《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等文章。

八、研究综述、学术会议

1993年,各种刊物还相继刊出了一些介绍蒙元史方面研究动态的文章,主要有许晓光《日本对蒙古伊儿汗国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第1期)、张永江《1990年日本蒙古史元史研究综述》(《蒙古学信息》第1期)和《1991年日本蒙古元史研究综述》(《蒙古学信息》第2期)、喻大华《论中国历史学界研究元史的热潮》(《辽宁师大学报》第3期)、王秀丽《1992年辽金元史研究动态》(《中国史研究动态》第6期)和《十五年来的元代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1期)等文章。同时,也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先后举行了“元代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和“《全元文》编纂工作座谈会”(《文学遗产》第5期),1993年7月,中国蒙古史学会在呼和浩特举行学术讨论会(《内蒙古日报》7月30日)。这些活动必将促进蒙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